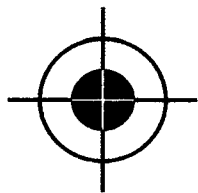


■ 海峡文化研究丛书



➤ 儒学与当代台湾

杨华基 刘登翰/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学与当代台湾/张文彪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211-06149-5

I. 儒… II. 张… III. 儒家—思想史—研究—台湾省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8750 号

儒学与当代台湾

RUXUE YU DANGDAI TAIWAN

作 者: 张文彪

责任编辑: 魏 芳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730 毫米×990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211-06149-5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总序

建设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提出，并获得中央的支持付诸实施以来，一个具有更大视野的台湾海峡经济区的设想，便受到海峡两岸政治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各方面人士的关注、讨论和期待。它不仅作为海西建设的战略前景，而且作为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一个平台，成为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极，将对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发生重要影响。

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每一个经济区的形成，并非偶然，都有其深厚的人文背景作为基础，并且还将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伴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因此经济区的概念，同时往往也是一个人文生成和发展的文化区的概念。从历史上看，台湾海峡两岸，自古以来，尤其是晚明以后，便有着密切的人员往来。随着南徙闽粤的中原移民在长期定居之后再度跨越海峡，东徙台湾，成为台湾社会的人口主体，中原文化也随同移民的携带，以闽南和客家的地域文化为主要形态，成为台湾社会建构的文化基础，使台湾社会的发展与祖国大陆社会同质化和同步化。在中国的文化地理上，闽台——或者更准确地说，以福建为中心包括浙南、江西和粤东的台湾海峡西岸与台湾海峡东岸的台湾，一向被视为一个共同文化区，即今日我们所说的台湾海峡文化区。对海峡文化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华文化在两岸延播、承传、发展，并成为两岸民众共同的精神信仰和纽带的一份历史见证，而且对今日关系两岸和平发展、两岸经济互补双赢、两岸文化和谐共荣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2004年12月，福建省成立“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设在福建社会科学院，同时成立“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会”，挂靠在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和研究会成立后，致力于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海峡文化研究，推出成果，扩大影响，营造氛围，把海峡两岸的文化



研究、宣传和交流提升到新的水平。

这套“海峡文化研究丛书”即是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为实践这一目标而策划、组织的一项文化工程。它以海峡两岸文化为研究对象，辐射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层面，跨越历史和现实，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作风，撰写系列的学术专著，希望能对海峡两岸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更深入的观察和深刻的解读，对两岸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和谐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最后，感谢在本丛书在策划、组织、撰写和出版过程中，给予我们热情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们以及相关单位。

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



导 言

儒学传统源远流长，是祖国大陆，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主流。从历史上看，明清时期的台湾就早已深深地浸润在儒家的价值系统之中；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台湾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凭借的就是儒家价值观；战后台湾虽然历经 50 多年快速工业化与商品化的冲击，儒家价值观仍大量保存在台湾民间生活之中。而在学术领域，台湾儒学研究与发展在方法和具体路径上走着一条十分独特的道路，其与香港新儒学的交流与相互影响，被海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港台新儒学作为近现代以来儒学的一个重要学派，为儒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巨大成绩。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应运而生，其第一代代表人物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第二代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挺立起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创造性地融合西方思想，回应欧风美雨的挑战，继承并发展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创造新的哲学系统，重建中国哲学与中国学术。其第三代代表人物杜维明、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等学者的思想更加开放，反省现代性与全球化，思考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科技、东方与西方、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诸多问题。这些学者对台湾儒学发展影响至深。其中有许多学者的主要学术活动都在台湾。可以这样说，两岸文化交流，无论从民间生活还是从学术思想上看，都无法回避儒学的存在与影响。

与祖国大陆不同，台湾儒学的存在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一直没有中断过。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一些大陆学者随国民党到台湾，岛内的学术气象与国民党政治和军事上的一路败退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为了有效地稳定民心安抚社会，蒋介石从一开始便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尤其是传统儒学的作用，以求借儒学强调“正统”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当时提倡儒学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社会提供了意识形态重新稳定的

路径。比如在教育领域，台湾中学语文教材突出传统文化，选题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辅以各家思想，培养学生的文章道德；教师被视为道德化身，体现敬业奉献精神，在弘扬儒学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使儒学对台湾教育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于是，传统儒家学说曾经一度也成为台湾当局的治世哲学，这不仅仅因为长期以来三民主义思想一直受传统儒家哲学的深刻影响，以及大多数从事三民主义思想研究的学者同时也是儒学研究的知名人士。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当时的三民主义与传统儒家哲学一起，形成了台湾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两大支柱。

应该说，当时的蒋介石是比较深入地看到了儒学无论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还是作为平常百姓贞定生命与生活方向的常道恒规，对于哪怕只是希望在台湾岛上长期保持政治强势的国民党来说，都具有无法替代的借重意义。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过去一直坚持的政治主张变得昏沉黑暗，但是无论怎样变化，民众的生活还得继续，所以依靠的人伦毕竟非得具体实践不可，而在人民身上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轨则，依然非儒家的文教莫属。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总是需要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庶民百姓也许不必深论孔孟儒学的基本思想，但总是必须依赖儒家的规范常礼来建制并维系家庭和社会的客观结构，有了这样的客观结构，人才能在这个世间安身立命；而对于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那些知识分子来说，如何把他们的问题引向传统儒学而非对现实的批判，则无论如何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

20世纪50年代后，新儒学由祖国大陆转向港台，经唐君毅等代表人物阐释赋予其当代含义。它关注儒学与文化、教育、经济现代化关系问题，反思中国百年历程，基于亚洲“四小龙”重视儒学与现代化成功经验，提出了在西方文化圈之外仍然存在着其他的通往现代化发展之路，并强调亚洲国家尤其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深厚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可以在儒学思想基础上发展经济、建设新文明；主张中华民族文化本位立场，自信自强主体意识和自尊自守独立人格，融合中西文化，发展中华文化。但是许多港台新儒家学者在坚持传统儒学的同时，却对西方采取了更多是主观的贬抑态度，对国际社会出现的秩序问题，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现象以及现当代亚洲国家和地区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道德问题等等，往



往简单地归结于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甚至由此而否定新文化运动。他们对把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与危机问题归结于传统历史文化的激进观点，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认为历史与文化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历史文化的真正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它代表了我们民族的过去，而在于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民族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向。与其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来自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和缺少理解把握历史传统的正确方式。所以出路并不在于尽可能地把我们与自身的文化历史相隔离，而是必须走进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向未来的契机。

尽管台湾新儒家学者长期以来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某些不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所限定的恒常价值在解决人类文化发展中所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他们的探求和思索与西方 20 世纪以来在打破了有关“科学万能”的神话后兴起的人本主义和新人文主义学派相呼应，应当说是构成了人类自我认识和自我反省的一个环节和侧面。而且客观上儒学观点在诠释台湾现代发展方面，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分析视角。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道东之传”——明清时期儒学传入台湾	(1)
第一节 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与儒学的系统传入	(1)
第二节 朱子学说与台湾儒学	(7)
第二章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作为台湾反殖民意识和面向新文化的儒学	(20)
第一节 受压制同时也最充满反抗精神的台湾儒学	(21)
第二节 面对新文化冲击的儒学	(29)
第三章 三民主义哲学与传统儒家思想	(43)
第一节 作为三民主义哲学基础的儒学	(43)
一、儒学与三民主义关系的理论溯源	(44)
二、作为台湾意识形态影子的儒家学说	(53)
三、心物合一论的儒学根源	(59)
第二节 逐渐走向冷清的台湾传统儒学	(66)
第三节 台湾士林哲学的儒学诠释	(75)
一、台湾士林哲学的理论渊源	(75)
二、台湾士林哲学的学术影响力	(77)
三、儒学的士林哲学化和士林哲学的儒学化	(79)
第四章 面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台湾新儒学	(89)
第一节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的台湾新儒学	(90)
一、关于新儒家的界定	(91)
二、《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发表及其意义	(94)
三、《鹅湖》月刊的创办与台湾新儒家的新发展	(97)

四、台湾新儒学的不同流派·····	(102)
五、台湾新儒学的代表人物·····	(107)
第二节 台湾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新儒学·····	(143)
一、新儒学教学与研究基本纳入了制度框架中·····	(144)
二、第三代台湾新儒家学者的学术性格·····	(148)
三、第三代台湾新儒家面对的新课题·····	(158)
第三节 台湾新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潮·····	(173)
一、台湾自由主义的发展与新儒学的初步分歧·····	(174)
二、新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冲突·····	(181)
三、激辩之外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的比较·····	(186)
第五章 台湾儒学的发展前景：诠释、改造和转化·····	(199)
第一节 对儒学发展的现代反思·····	(199)
一、当代新儒家与现实政治社会的关系·····	(199)
二、当代新儒家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	(206)
三、“内圣外王”与东亚社会发展之经验·····	(213)
第二节 台湾儒学——儒学之区域研究的典型个案·····	(218)

“道东之传”——明清时期儒学传入台湾

台湾儒学起源于明末的第一座庙学的建立，其思想主要继承宋明以后儒学之经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的传统。清代是台湾儒学的发展期，经过两百多年的传播与垦殖，儒学已经在台湾生根，这两个时期台湾社会思想的主流是福建朱子学。由于儒学在台湾发展的时间不长，又未能超越闽学的笼罩，因此基本上可以说台湾儒学是闽学在台湾的一个支脉，这是从思想学说的根源性上把握台湾儒学。另一方面，儒学从它传入台湾的第一天开始，便与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当地民间信仰以及移民社会民风习俗相结合，因此台湾儒学又带有十分明显的地域特点。

第一节 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与儒学的系统传入

台湾师范大学潘朝阳教授认为：“就台湾而言，儒学与儒教始于明末漂流来台的浙儒沈光文，但以国家形式而在台湾始播儒学、儒教者，应推

明郑漳浦儒生陈永华之立圣庙、建太学于台南。随郑延平拒清渡台的儒士，多以浙东东林、复社、几社精神，为台湾播下了抗拒强权不义之义理种子，表彰了孔孟春秋节义。康熙领台之后，台湾承大量闽儒之东来传教，乃成为朱子儒学传播宣敷之区。通过在台儒吏、儒士的努力以及书院、义学、文社的设立，朱子儒学遂从福建而普化于台地，成为数百年来台民的文化常道、台湾的文化主体。在台湾的浙东儒学和朱子儒学，至清中叶后邓传安于鹿港建文开书院显其千里结穴、龙归一海之兆，遂有汇流合一之势。”^[1]这里所谓东林党，即明中叶由顾宪成、高攀龙等创立的。当时国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变乱四起，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因政争丢官回乡，心志由致仕转向讲学，与诸儒生一起修复无锡城外闲时杨龟山讲学的东林书院，并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东林会约》，除讲论经史之外，更大肆抨击朝政臧否人物，基本上成为一个兼具学术与政治性质的儒生学政团体。在个人方面，东林党特别提倡浩然气节，对家国、天地、师友讲求忠信，为护道而生死不计，勇于以生命抗拒，这种强调大义、宁折不弯的儒生精神，在以弱势抗击席卷而来已占据整个中原的清军的郑成功来说，堪以重用。而浙东儒生早在杭州城破之后，便纷起义师全力抗拒清军，尤其是以宁波为中心地区抗击清军最烈。由东林党到浙东浴血抗拒清军，将儒家精神中的忠信、勇毅的风骨节操发挥到了极致，这在抗清和收复台湾的主要诉诸武力的行为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支撑力量，这种精神是非常合于孔孟春秋大义之道的。而且郑成功原本就是一个儒生，曾就学于南京太学，当时情况下就结交了不少江南儒生，对东林和浙东儒生的思想精神是持支持并有所参与的态度。可以说，郑成功收复台湾是带着东林和浙东的抗拒型儒家精神去的，这种儒家精神也就是一些台湾学者所说的“南明遗民性”。这种儒家精神特征在后来台湾历史中一直延续下去，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50年时间里，台湾人民的不屈服的抗争就有这种“南明遗民性”在起作用。

很显然，台湾儒学的起源时间，是分为郑成功明末抗清和收复台湾之初，以及清康熙重新把台湾纳入行政版图之后两个时期的，特别是从清领台湾以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对当地儒学发展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是闽籍儒吏、儒士。一方面是闽、台两地地缘相近，每一个时期台湾移民中人数比

例最多的几乎一直是福建人，读书人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自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明、清两代的许多主管台湾官学、书院的官员基本上都来自福建，自然而然地将闽学传入了台湾，其中的主要人物有陈瑊、蓝鼎元，以及虽然未到台湾，却曾受邀为台湾诸罗县庙学撰写碑记，并有多篇文章收录在台湾地方志的闽学人物蔡世远等。^[2]

但是儒学在台湾的存在并非只是以单纯的学术方式，而在它的初始阶段更多的是通过日常教化过程和移民过程中接续下来的中原生活方式，把观念浸透渗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从而使民众自然地生活于孔孟常道，虽日用而不知。历史上的儒家之道原是一个涵盖宇宙、社会、人生的整个概念，尽管我们说在儒家思想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内圣外王”都只是一个理想，但恐怕人们也很难否认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力和制约力，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儒学通过移民的方式进入台湾的过程。这种普化为民众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家思想，成为了现实社会的慧命常规，有台湾学者认为，这种转化就是儒学与儒教的分野。

按照传统儒学的观点，一位儒者不能仅仅表现为对儒学经典形上意义的追求和认同，他同时必须是一名儒教的实际推展者。个人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关涉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民族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则关涉到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问题。不是抽象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而是如何真实而具体地成为一个中国人的问题，这一直是台湾移民过程中为民众所不断思考和坚持的。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坚持与思考，的确构成文化、历史、社会、政治的慧命常规，形成了台湾自文明的初始以来始终为中国一部分的传统。

此传统是以统治者施行教化的方式自上而下推行开来的，主要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作为当时台湾的新征服者，郑成功在倡导儒学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一方面是出于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有关。据记载，郑成功“性喜春秋，兼爱孙吴。制艺之外，则舞剑驰射；楚楚章句，特余耳”^[3]。郑成功15岁时进南安学弟子员，19岁时赴福建省乡试，20岁左右入南京太学并拜当时名盛一方的大学者、诗人钱谦益为师。可以说，郑成功整个青少年接受的都是儒家思想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造就其“善养浩然正气”的人格，除了因为其勤奋好学之外，也与其长

期生活在福建这一作为原受理学发扬传播、朱子讲学传道的儒家醇厚之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后来清军入关，孔庙成了儒生们集体或个别反清活动的出发地点，这时候的郑成功就和许多儒生一起参与了哭孔庙、焚儒服等各种反清仪式。应该说，郑成功看到了孔庙在讲学和祭祀之外的聚集起来抗争外族入侵的功能，尤其是儒家思想在维系传统方面的巨大作用，这也是他到台湾后非常重视儒学并不停地修书院、建孔庙的主要原因之一。明末政治腐败，致使大多数儒生难以进入政府，即使为政府所用，亦很难通过正常的上升通道使宦途显达，而清军占据中原的整个战争过程中，社会动荡更进一步大大削弱了以授徒、做官为生计的儒生阶层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儒生阶层、尤其是布衣儒生，便站到了民众的一边。这时候，领兵抗清的郑成功清醒地看到了儒生阶层在社会上富有声望，以及他们对清朝的不满，从起事之初就有意识地招贤纳士，尽力邀请各地德高望重的儒生为自己运筹帷幄，并与之共同商议反清复明、定国安邦大计。这不仅加速了后来收复台湾的步伐，而且坚定了他对儒学的信念。

郑成功与儒学的关系，尤其是与明朝后期诸儒的关系，可以从台湾延平郡王祠名单上有所了解，从祀者中有曾樱、徐孚道、王忠孝、沈光文、辜朝荐、陈永华等人^[5]。这些从祀者无论从师学渊源上还是个人的践行原则上，都与明后期儒学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比如，长期跟随郑成功并在厦门的一次与清军作战中兵败不甘就俘而自缢的曾樱就是一个东林党人^[6]；徐孚远则在崇祯初年就与人一起共同创立几社，意在“绝学有再兴之义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7]，其入世经世的思想色彩十分浓厚。而儒家即仁教，为孔子所创，其基本思想在于内圣成德，这一思想经过历代转化，入世经世思想变得越来越明显。明朝末年，清军大举南下，无数儒生舍身加入抗清队伍，作为这样一支队伍的统帅，郑成功希望聚集在自己身边的儒生与自己一样，共同面对家国天下与文化传统的危机问题，因此入世经世思想正是当时应对时局所十分需要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时郑成功以师事徐孚远，徐孚远后来也随郑成功一起到了台湾。此外，延平郡王祠从祀者的沈光文，原本就出于明末儒家黄道周门下，作为台湾文学的鼻祖，他早郑成功9年到台湾，开始一直以教台湾少数民族学汉语言和四处行医为业。

从祀者中在全面传播儒学和推进儒学不断融入岛内民众文化生活起最大作用的，当属陈永华。陈永华早年在厦门储贤馆接受儒学教育，师承曾樱与徐孚远^[8]。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看到了连年征战给民众带来的巨大困难，安民养民成为他当时首先必须着手努力去做的第一件事情，于是他重用陈永华，为台湾筹划长治久安、有利于休养生息的重建计划。这其中除了民生问题，再一个就是文教问题。民生问题主要是一些施政实务，包括开垦荒地、栽种五谷、插蔗煮糖、修筑堤坝等等，在不长的时间里，初步解决了主要的民生问题。而文教问题并不容易，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对于在岛内兴新儒家思想颇有一番决心，但他在第二年便不幸病逝。之后，陈永华辅佐郑成功之子郑经经略台湾，并一再强调在当时情况下，台湾务必要“速建圣庙，立学校”。在他对郑经的一番论说中，可以看出陈永华在收复台湾初期便十分急切地要确立儒学的主导地位及其采行具体而明确的措施全面推行儒学的独到政治眼光，他说：

昔成汤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兴，岂关地方广阔？实在国君好贤，能求人才以相佐理耳。今台湾沃野数千里，远滨海外，且其俗醇；使国君能举贤以助理，则十年生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与中原相甲乙。何愁局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则当教之。使逸居无教，何异禽兽？须择地建立圣庙，设学校，以收人才。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9]

陈永华的话带有很鲜明的孟子学色彩，基本上廓清了台湾政教措施的大致基础与方向。由荒野而致文教，有台湾学者认为应该把陈永华之言看成是台湾儒学第一篇重要文告，也正是由此开始，台湾真正系统而完整地接续上了中原文明。故台湾民众馨香敬祀开台圣王郑成功数百年，这一方面固然敬谢其收复台湾之功，另一方面亦感念其所带来的儒学文化。

一般说来，对于儒家思想在一个地方的兴起的评述主要有“内”、“外”两种立场。所谓“内”的立场，就是儒家内部对于儒学的立场和期许的自我陈述，这些立场和自我期许通过儒家的原始经典或对于这些原始经典的不断解释，以及对现实社会的积极治理而呈现，既一以贯之又不断顺应现实的变化。所谓“外”的立场，就是儒家以外的思想和宗派对于儒家现实可能的评述，在这方面当时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处于分散和弱小状

态，基本上无力对儒家进行评头论足。于是，康熙五年（1666年），敬奉孔子的圣庙建成，旁置明伦堂，随之建立起了台湾的考试制度，同时“各社令设学校延师，令子弟读书”^[10]。当时庙学的国子监助教亦是由同样出自厦门储贤馆的生员并同样受教于徐孚远的叶亨担任。庙学的教育与祖国大陆没有什么差别，仍然是注意整理古代文献并从“损益”中阐发对于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关系的理解，并逐渐在当地形成以“六经”为基础的经典体系。“六经”的核心内容是古代的礼仪和制度，从对于“礼”的专注，我们可以认定台湾以陈永华为代表的儒生，其主要的角色是政治性的，其根本的理想是希望通过推行儒家思想来制订和改造出一整套适合台湾社会的古代礼仪，从而实现其社会理想和秩序安排，这一点决定了陈永华兴办文教既是儒学自身在台湾发展的需要，因为儒家有强烈的人世倾向；同时这些举措也是稳固统治的需要，因为儒学所提供的意义支持是当时稳定台湾民心所需要的。

这种儒学教育的成效相当明显，一方面使儒家思想第一次以制度化的形式在台湾扎根下来，另一方面最直接的效果是自孔庙建成到郑氏降清才短短的17年时间里，庙学诸生深造有得，在参加科举考试中纷纷榜上有名，这可以从康熙年间高拱干、周元文所修《台湾府志》的“进士年表”、“举人年表”、“贡生年表”所列名单中可见一斑。

在这方面明末儒者黄梨洲先生曾撰文赞许郑氏父子经略台湾的功德，曰：

郑氏不出台湾，徒经营自为立国之计，张司马作诗诮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问虹梁？”曰“围师原将略，墨守亦夷风。”曰“寄语避秦岛上客，衣冠黄绮总堪疑！”曰“只恐幼安肥遁老，蓁床皂帽亦徒然”；即有贤乎郑氏者，亦不过济之田横、徐氏之间。某以为不然！自缅甸蒙尘以后，中原之统绝矣；而郑氏以一旅存故国衣冠于海岛，称其正朔。在昔有之，周厉王失国，宣王未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系于厉王、下不系于宣王，后之君子未尝谓周之统绝也。以此为例，郑氏不可谓徒然矣。^[11]

在当时的情形下，清朝统治者以军事的方式占领整个中原，一直以天下中心自许的明朝汉人惨遭亡国亡天下之痛，而郑成功却能在台湾创建春

秋孟子之义理传统，确实让许多儒者以为此举为华夏之人保存了不绝如缕一丝血脉的慧命常道，从而在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把台湾看成是华夏之人安身立命之地。这一看法后来随着清朝统治者对孔孟之道的有增无减的推崇和满族一代又一代的不断汉化，而逐渐变得不再坚持了。事实上，清朝取代明朝，仅仅反映出的是腐朽、堕落的上层儒生阶层的崩溃和充满活力、心怀不满的下层儒生阶层的崛起，社会的整体结构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

第二节 朱子学说与台湾儒学

从台湾 400 多年历史来看，儒学进入岛内主要分两个时期，一是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跟随而去的儒生，其成分较复杂，有东林、浙东儒学，亦有福建闽南一带的儒生，尤其是东林儒学的特点特别富有抗拒夷狄之冲劲，这种带有喷涌而出反抗力量的儒学精神在郑成功抗清和收复台湾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另一个儒学进入台湾的时期，主要是清朝恢复对台湾的管辖之后，那时对台湾起比较大的影响作用的是从福建渡海东传的闽学。

闽学是宋代以后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由朱熹开创并得以绵延发展数百年，又称为“朱子学”。清人蒋垣在其《八闽理学源流》（卷一）中写道：

濂、洛、关、闽皆以周、程、张、朱四大儒所居而称。然朱子徽州人（按：此指祖籍），属吴郡，独以闽称何也？盖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数先生。学以成功，故特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12]

可见，朱子学之所以称为闽学，主要是因为朱熹出生、生长、受学、讲学、著述等活动大多在福建的缘故。可以说，朱熹儒学思想的根在福建，而福建与台湾仅一水相隔，不断的移民人群中亦不乏饱读诗书的儒生，他们不断地把闽学带到了台湾并传播开来。需要注意的是，闽学向